罗马与中国

——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

〔美〕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著

丘进译

人民交通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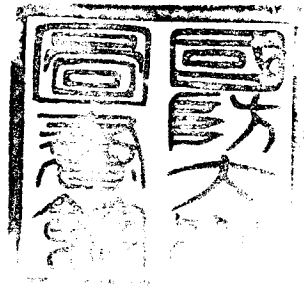
跳吧！小白兔

国防大学 2 060 1978 9

罗马与中国

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

[美] 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著
丘进 译



人民交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1 号

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

FREDERICK J. TEGG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9)

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

Luoma Yu Zhongguo——Lishi Shijian De Guanxi Yanjiu

[美]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著

丘 进 译

正文设计:刘晓方 责任校对:刘素燕

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3 北京和平里东街 10 号)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8.75 字数:230 千

1994 年 5 月 第 1 版

1994 年 5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6.00 元

ISBN-7-114-01884-3

C·00000

本书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美国加州伯克利)1939年版本翻译，并得到该出版社的同意，由译者译成中文出版发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对丘进同志翻译《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之管见

《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中译稿通过大量中外历史文献资料的比较分析与研究，不但介绍了西方史学研究中常用的历史比较法，而且还具体地通过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的交通与阻断的分析，说明了古代罗马帝国与中国之间的时隐时现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中国与东罗马关系的研究，虽然早在19世纪时已由夏德的《中国与罗马东部》开其端，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接其后，但它仅停留在地名、人物和史事的考订方面，尚未能将东西方的历史作一有机的对比联系，从而找出它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汉代对西域的经营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因此，此稿的翻译出版，不但会使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的历史比较法的具体应用，而且也是继夏、张二氏关于罗马与中国关系研究成果的一个新里程。

关于西方的比较研究法，我国过去在文学方面的研究谈得比较多，而历史学方面则介绍得极少；不久前出版的美籍学者汪荣祖《史传通说》一书，是其中的一种，而关于中外关系（交通）史研究方面，则尚无先例。本书之出版，无疑将为中国读者提供研究中外关系史（交通史）的一个新方法，开拓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中华书局编审　谢　方

1993年9月30日

译者前言

《罗马与中国　　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的一部代表作，出版于一九三九年。这部书突破传统的史学研究观念，提出并使用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即：针对历史上某一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将与之有较密切关系（在时空上）的历史事件详加罗列，在精细的对比中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该书列举的大量史实表明，在罗马帝国的盛、衰期，其本土及北境、东境经常遭受蛮族的进攻、骚扰，而这类“侵扰”，以及罗马帝国主动发起和被动接受的诸多战争，又往往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中国对西域地方的经营及政局变化的影响；从而在理论上将古代东西方的交往（尽管在当时应属于较疏松、较间接的交往）由简单的经济关系上升到复杂的政治关系，使当时的世界形势展现出一种全新的画面：每当中国西域地方政局平和、牧歌悠扬、各部族向汉朝廷称臣纳贡、驼队马帮西去东来之时，西亚及欧洲境内大多宁静无事，罗马帝国与四邻蛮夷也相安无扰；一旦天山南北发生动荡，东西交通遮断，帕西亚的骚乱便随之即起，继而便在罗马史家笔下记载了一系列的战争和蛮族入侵事件。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作者的这一构想和描述似乎还缺乏足够的和直接的历史证据，因而也很难被普遍接受为当时欧亚大陆上的历史真貌，但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推崇和加以肯定的：

一、本书列举的大量事实和展开的严密论述，令人信服地将两千年前的东西方世界纳入一个有机联系着的社会整体；

二、在这个庞大的社会整体的东西两极，分别是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它们几乎同时经历着自己的兴盛与衰亡，恰似两个巨大的车轮，带动着世界历史的前进。

如果说这种世界历史的进步表现出某种稳定的导向的话，那么本书的结论雄辩地证明，这种导向源于中国，尽管当时汉帝国的统治者们是在无意之中作出影响世界全局的种种决策。换言之，中国对古代世界历史的进程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罗马与中国》这部书字数并不算多，但它包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书中涉及的时空跨度大，既记叙了自凯撒至图拉真的九位皇帝时期罗马帝国与周邻国家和部族的战争史，也描述了中国两汉时期的西域经营史，还用了适当篇幅论及帕西亚至北俄罗斯地区各民族的动态。其二，作者不仅写了东西方世界的政治史、战争史、交通史，在古代地理学（尤其是欧亚大陆北方旷原地区的地理面貌）的考证上也花了不少笔墨，因此读后使人感到视野十分开阔。其三是本书的资料引用十分广博，从书末列出的参考文献清单上就足以看出这一点：因重复引用率较高而将名称缩略的大型书刊 59 种，关于罗马帝国的资料 81 种（涉及作者 65 人），关于罗马边境省份的资料 24 种（涉及作者 18 人），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的资料 24 种（涉及作者 21 人），关于伊利里亚、马西多尼亚和密西亚地区的资料 30 种（涉及作者 22 人），关于罗马东方边境省份的资料 22 种（涉及作者 19 人），关于罗马帝国周边地区各部族情况的资料

30 种（涉及作者 24 人），关于萨尔马特人和博斯普鲁斯各王国的资料 23 种（涉及作者 19 人），关于亚美尼亚的资料 16 种（涉及作者 15 人），关于帕西亚帝国的资料 52 种（涉及作者 41 人），关于汉帝国的资料 50 种（涉及作者 37 人），关于中国西域的资料 29 种（涉及作者 15 人），关于蒙古与匈奴的资料 32 种（涉及作者 25 人），关于欧亚大陆北方民族艺术的资料 30 种（涉及作者 21 人），关于东西方交通的资料 87 种（涉及作者 52 人）。这份冗长的清单上所列文献，在书中均有参引，绝非故弄玄虚之举。仅仅查找、统计、归纳这些资料，就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而其中包含的大量历史信息，更使得“罗马与中国”这项专题研究（如果还不能成为一门学问的话）具有牢固的科学基础。

我是在 1982 年秋才读到这部书的。是年我入暨南大学，从朱杰勤先生攻读研究生课程。朱先生取出此书，嘱我边读边译，一方面作为专业外语课的修习，同时也可以收积一点外文的资料，参考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当时我的英文水平有限，译起来相当吃力，加之书中有不少法、德、意等文字，更增加了难度（这又致使我后来花了许多时间去从陈绛雪老师修习法文）。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粗粗地译完了全书的正文（注释未译）。以后若干年，未再触动它，译稿被积压得发黄、变脆，几成废品。我的研究方向是汉代中西关系，论文当然是立足中国而作，但不可否认，在某些观点上，我是受到《罗马与中国》的影响的，以致后来出版的有关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书，我将其取名为《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仅从题目上看，两部书几乎是姊妹篇，然而这里需要特别地申明，这两部书主题不同，立足的基础不同，方法不同，内容更不同，而且就

学术价值而言，拙作断然不敢与梯氏的《罗马与中国》相提并论。

当时，朱先生在审阅我的译稿时曾发表过不少评论，大意是：由于作者立足于西方，谙熟罗马史而疏于中国史，又不懂汉语，所以其书难免厚西薄东，详罗马而略中国；考证也极繁冗，文字十分晦涩，几近佶屈聱牙，一般读者难以读懂，但作者提出的学术观点却是十分重要、十分有价值的，凡学习和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人，读了这部书，必会有所收获。对此，我有着较切身的体会，事实上，凡世界史之研究者和学习者，只要细读这部书，大多会对古代世界的整体性和中国在其中的显赫地位产生新的认识；而如此立论的是一位西方史学家，这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此外，如前所述，书中的资料引征不仅广博周全，而且切中要害，确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记得有一回在乌鲁木齐参加中亚文化协会的学术讨论会时，龚方震先生对我谈起这部书，也对其中罗列的文献资料之多之广之精表示赞赏。

正因如此，出版《罗马与中国》的译本是我多年的愿望，也恰恰由于它本身的一些缺憾，加之近来国内出版业的实况，我知道出版这部书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两年前，我的《中国与罗马》出版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某大学出版社一位编辑了解到此事，表示尽管他所在的出版社刚刚起步，基础还很薄弱，但毕竟是高等学校的出版社，应该扶持这类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著作。由于他的鼓励，我在其他业务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每天深夜挤出一个小时，将此书连文带注重译了一遍。原以为可以顺利付梓，讵料在交稿时，该大学出版社却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某种为难。我完全体谅出版社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不愿使其感到勉强，因而主动撤回了书稿，宁

可让它再次被束之高阁。

现在，《罗马与中国》在人民交通出版社的支持与推动下得以问世了，其中的复杂过程自不待言，我只是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图书出版工作的艰难，毫不逊于学术研究的艰难，甚至每每前者难于后者。人民交通出版社主要是出版交通科技方面的图书，但该社也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多年来已推出百余种关于公路史、水运史、陆运史等方面的著作与史料，对我国的交通史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觉得，这对于一个现代科技领域的权威出版社来说，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可贵。

下面就译文本身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一、译文中的外国人名、地名，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弧注出原文，以后不注。

二、在原书中，注释均为页下注。译文为排版之便，改为章末注。

三、注释中的外文人名、地名、书刊名极多，为减其繁，除个别不注原文难解其意者外，均只用中文译名，不注原文。

四、原书的注释，以英、法、德文为主，还有意大利、拉丁、希腊等文字。因译者学识有限，一般只译前三种文字，好在其他几种文字的份量很轻，无伤大雅。但缩略语表中59种书刊的名称全部译出，列在书末。

五、原书部分注释，引证的资料过于繁杂，为了缩减篇幅，本译文只选择了其中较重要或具有代表性的，舍弃了一些重复的、一般性的或难以查到原文出处的资料名称。

六、原书中有14幅地图，由于复制方面的困难，只好全部删除了。

七、原书中的地理考证，多是针对古希腊和罗马地理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者的原始地图而作的，由于译文中删去了地图，某些考证也就难以理解，甚至个别地方还会显得与前后文不衔接。经征求专家意见，此类段落也予删去，但这只涉及极小的篇幅。

八、原书中有若干处引用了中国古籍（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中的记述，但显然是作者转引自其他西方译者（如沙畹、伯希和等人）的译本，而非第一手资料。为使引文准确，译文均恢复到中国史料的原文。

九、为方便读者核对原书，或作引用时参考，在每页译文的外侧都注出原书相应的页码和段落，如：v-a、86－b，分别表示此处的译文相当于原书第 v 页第 1 段、第 86 页第 2 段，c 则表示第 3 段，依此类推。

另需要说明的是，本人的中外文水平都不高，此译作虽得到李锦平教授、梁作楳教授的审校和指点，但仍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我恳切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丘　进

一九九三年九月　于北京

前　言

v-a　关于本书所进行的这项研究的原因，还要追溯到过去的年代，这项研究的部分结果，在下面即将提到。三十年前，我发现自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就学者们看来，历史是一门科学，然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却全然不具备物理学或生物学研究成果那样一些特点。于是我深感有必要对历史学家们展示的他们的工作目的进行透彻的研究，与此同时，我也可以使自己熟悉多种领域科研工作的实际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为此而发表了一些文献和著作[1]，我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即历史学家们对有关的资料进行筛选、整理，苦心地加以研究，但在展示其研究结果时，却往往以一种与科学无涉的文体来表述。有鉴于此，我遂抛弃了上述惯常的研讨方法，并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除了用以撰写历史文献著作外，史料是否还可以有别的用途？既然史料确实记载了人类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那么能否从这些记载中寻得某些道理，以使我们了解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世界里“万物变迁之途”呢？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况且，既然政
vi-a　府在知识上要依靠学者，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历史学家（尽管他们并不企图这么做）是否可以利用他们集累的资料，推衍出某种足以指导人们行为的知识和道理呢？

vi-b　这里便提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利用史料进行考证必须具有三方面的前提：其一，

史学家的目的不可单纯为了著书立说，而是要对某一问题加以调查和探究；其二，这个待调查探究的问题需与一系列有关的历史事件相联系；其三，开展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应该在于对世界上不同地区发生的相关事件进行比较。

vi c 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这项比较首先要求研究者能够洞察那些与研究课题有关系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并从中发现一个问题；然后，在最初的尝试中，似应选择那些已为史学界所公认无疑的史实或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只要经过细心的摸索和考察，是一定能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研究课题的。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无不认为，蛮夷部落对罗马帝国的不断侵扰是一组可以分别逐个予以探讨的史实。于是他们便根据一种直觉开始了工作。他们设想，在蛮夷民族的不断侵扰之中，一定包含着某种有待于深入发掘的潜因，并且认为自己有责任为解释这一现象提出某种理论。显然，历史学家们遵循着一条最普通的途径去从事科研工作。然而，当许多与蛮族入侵罗马有关的史实被如此地加以研究之后，研究家们却无一能从中推绎出预期的那种理论，从而对各种有关现象作出完美的解释。的确，这些理论的基础仅仅是直觉或假设，而不是对一系列历史事实进行综合的比较和分析。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许多已被广泛采用的观点和理论、方法，实际上依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考察。

vii a 蛮族的不断侵扰这一事实，恰恰对历史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依照前述三项前提，首先应尽量搜集与课题有关的全部资料，接着便可按照以下的步骤开展工作，即在500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依年代顺序，从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战争以及欧亚大陆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朝代发生的动乱中，对从不列颠（Britan）到柬埔寨（Cambodia）之间的每一

个国家的史料都加以分析、筛选。而后，尽管要耗费大量时间，仍不妨将这些国家的历史按年表的形式排列起来，依照欧亚地图上的地理顺序，对相关的事件加以比较。应该看到，这样做的全部工作，均在纯理论的范围内进行的。十分令人满意的是，在把这些史料详细地加以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竟会出乎人们意料地准确无误。

vii b 本书所罗列的史料，仅与公元前 58 年到公元 107 年这一段时期的世界形势有关。在上述期间里，每一次欧洲的蛮族起义都发生在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或是中国的“西域”战争之后。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里发生的事件有着十分精确的共同之处：紧接在罗马东部战争之后，无一例外地在多瑙河（the Danube）下游和莱茵河（the Rhine）地区就有暴乱发生，而天山东部的战争也总是无一例外地引起维也纳（Vienna）和布达佩斯（Budapest）之间的多瑙河流域的骚乱。这段时期发生在罗马帝国欧洲边境上的起义和侵扰就达 40 次之多，而且其中在多瑙河上游发生的 9 次就是发生在中国天山东部的车师后王庭和吐鲁蕃地区的战争之后，其余 31 次发生在罗马尼亚境内多瑙河流域地区和莱茵河流域地区的动乱，则相继暴发于罗马帝国东线，尤其是叙利亚（Syria）和

viii a 亚美尼亚（Armenia）的战争之后（罗马时代的史料少得可怜，31 次中仅 3 次有记载，而且不曾提到关于多瑙河下游的战争情况）。即使只有一些极为简略的缩影，我们也完全可以指出，在罗马帝国东境的战争中，18 次是以中国西域少数部族的战争为先导，而且，欧洲的 40 次暴乱中，有 27 次与汉朝的西域政策有关，或者至少与这个政策所引起的局势变化有关。

viii b 这里略举一例，或许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历史事件之间的

互相影响。东汉的伟大使臣班超，曾在塔里木盆地一带地区维护了中国的政权和声威，历时达31年。班超于公元102年获准告老还乡。他刚离开西域，从甘肃到帕米尔高原一线便爆发了战争。其后，中国军队不得不于公元105～107年间撤离西域。进而，公元105—106年，在近东，帕西亚（Parthia）国王帕柯鲁斯（Pacorus）被推翻，与此同时，柯奈里乌斯·帕尔马（Cornelius Palma）占领了皮特拉（Petra），吞并了阿拉伯（Arabia）。在欧洲，公元106年，图拉真（Trajan）入侵达西亚（Dacia），并于公元107年吞并之。再看看更远的地方。约在公元106—108年，罗马人被迫撤离了苏格兰（Scotland）。此时，匈奴人正从中国人手中夺得车师后王庭和吐鲁番（公元105年），而与此事相关的，则是公元107年蛮族人侵潘诺尼亚（Pannonia），即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Hungary）境。

viii c 以上分析所得出的一项重要成果，是（首次）建立了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应该看到，这种联系本身也是一种历史事实。虽然有一些史实迄今尚未被探明真相，但其中的互相联系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某些史实之所以含混不清，正是由于专家们总是孤立地而不是联系地对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加以研究。到目前为止，这种对欧亚大陆上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的方法，尚未对史学研究形成影响。

ix a 本书所进行的尝试，证明了这种在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对于研究欧洲历史，至少是十五世纪末以前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若要了解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彻底更全面地采用上述方法，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诚然，对于当代世界来说，并不需要将现今发生的重要事件一一描述才能开展研究。但是，如果想弄清欧洲向海外扩张所引起的

世界局势的实际变化，那么详尽地了解那些在古老的陆路贸易活动影响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ix b 在各种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固然不可能解答为什么在中欧不断发生入侵事件的问题，但它的确为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捷径。那么，对于罗马在亚美尼亚的战争引起莱茵河和多瑙河下游的蛮族起义，以及中国在天山的战争引起匈奴人类似的暴乱，又应作何解释呢？我们若按上述方法进行一番比较研究，这个问题就出现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它要求一种更为复杂的探索，而不仅仅是前面所采用的年表式的编写方法。换言之，研究的重点不可拘泥于年代的对比和审查，而是要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地理条件，进而揭示各有关民族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联系。例如，隔于黑海东西的亚美尼亚人和罗马尼亚（Rumania）人之间，隔于准噶尔盆地、西西伯利亚（Western Siberia）、俄罗斯（Russia）和波兰两边的天山民族和匈牙利之间的联系。在此序言中，当然不可能去对托勒密（Ptolemy）关于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浩繁费解的记述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只是，对这一方面所作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之结论：东方的战争、西方的侵扰，其原因盖归于商路的遮断。

x a 在这里，似有必要利用此机会强调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的迫切性，即商路的通断兴衰是了解世界各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公元1世纪还是20世纪，均是如此）。另外商路的变迁和贸易的中断，不但影响到蛮夷部落的安定，也对更大的政体组织造成震动。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研讨也是十分必要的。从以上观点来看，战争遮断了经过帕西亚的“丝绸之路”，其结果对于罗马帝国历史形成的影响也就显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